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贾平凹著  
《秦岭记》

## “古风大成”的现代笔记小说

□房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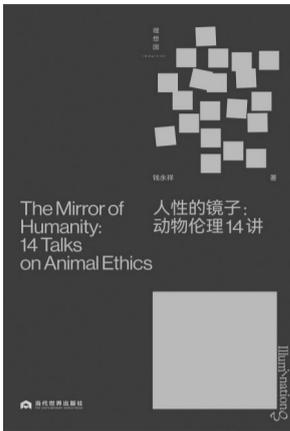
《秦岭记》是贾平凹创作于202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令我“重新审视”贾平凹的作品。众所周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数量庞大，风格各异，思想复杂，而令他为文学界瞩目之处，还在于他总是善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某种观照的独特视角，进而以此观察理解当代中国。《秦岭记》中，他以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传统为参照，再现秦岭的生命际遇。故事短小随意，气象阔大神秘。贾平凹整合中国古典“小说”与“散文”文体特征，展现了对自然、生命、文化等诸多命题的颖悟。

古代笔记小说，更近乎于文人补史心态，受到“文章学”思想影响，也有小品文“言志”气象，多强调“纪实”与叙述“雅洁”和“节制”，以此特征与偏于夸饰想象的志怪传奇小说，形成鲜明对立。贾平凹的《秦岭记》，是对古代笔记小说的复活与发展，以“笔记体”承载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表达。《秦岭记》写风土人情，写人物际遇，写草木动物，写梦境幻觉，也写狐鬼花妖，山精妖精，文体上混沌圆融，大气磅礴，内容上以自然与生命为本色。令人深思的是，贾平凹的秦岭书写，变成了现实与鬼怪共存的世界，一个古拙又现代，原始又神秘的世界。

具体而言，《秦岭记》以五十四个独立小章构成主体，也有外编一（《太白山记》）与外编二。贾平凹将笔记小说发展为现代长篇结构。没有贯穿始终故事和主人公，故事看似杂乱无章，却有着内在联系。夜镇、喂子坪、广货镇、观音崖、月亮崖、二郎山、南甲洼……一个个地名，形成一个如棋盘中棋子一般星星点点的故事，共同汇聚成秦岭大故事。这些微观区域，虚构成分居多，难以考据，却更具象征意义。贾平凹强调微观虚构地理区域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又与人事结合，往往先描述地域，再由地方引出人事。例如第一章，先讲昆仑山，引出秦岭和倒流河，再引到夜镇，主要人物宽性和尚与黑顺才出场。这些微观地域的人和事，共同构成秦岭大故事，筋骨却不是贯穿始终的人或事，而是文化与生命观念。

《秦岭记》外篇是《外编一·太白山记》与《外编二》。结构上看，《太白山记》由短章构成，类似微短篇小说；《外编二》类似《秦岭记》副文本，介绍主体笔记小说的发展由来，“讽喻世人世事”寓言性较强，有的近乎民间笑话；如《领导》中机警的小偷，以领导与妇联主任的奸情，要挟领导，竟被释放，且受到重用。《秦岭记》本部五十四个故事：第一部分主要写“秦岭小寓言”，“讽喻世事”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但这种讽喻，大部分讽刺道德沦丧、人心堕落，更是将人类的狂妄贪婪作为讽刺重点。第五十三章，屠客武来子阉割猪无数，最终被一个猪的幻象引诱落下山崖，摔成性无能。第二部分主要写“秦岭人生”，借助虚构秦岭山村世界，品咂人生百态世相与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第十二章，南甲洼村支书，生前矛盾重重，死后变成草人，也兀自争斗不休，直到全部消散。这无疑是对国人性格中好斗因素的劝诫。贾平凹对世情有深体察，这种对人际关系真相的揭露，超出时代制囿，表现出人性中的普遍因素和生命的悲剧意识。再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是《秦岭记》的重要内涵。《秦岭记》的关注点不仅限于乡土与城市对立这类表述，更倾向于描述即将逝去的生命状态。城市侵入乡土，且乡土溃不成军，野地的浪漫、自由自在的心性、天人合一的充盈体验，无可挽回地成为现代社会沉痛的纪念。贾平凹保存了某种天真乐观的美好期待，无火气和怒气，无道德面孔和训诫语气，更无居高临下的严峻批判，有的只是悲悯与包容，以及睿智通达的人格魅力。第五十四章，民国县长麻天池《秦岭草木记》记载的所有秦岭植物，都是有个性化的“活生生的存在”，葛条、枣树、香椿、菟丝子，有着各自命运，“很多树其实想飞，因为叶为羽状”。当深山峻岭也挡不住人们贪婪的目光，情感的谴责只能幻化为狐鬼花妖的幽默一刺，在会心微笑中暗含辛酸与苦涩。

“秦岭”对贾平凹意味着什么？正如贾平凹所说：“秦岭顶天立地，势力四方，混沌，磅礴，伟大丰富了，不可理解，没人能够把握，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秦岭既表征着中华民族命运变迁，也体现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感悟：尊重所有生命，对人世命运报以超然宽容态度。这也许就是贾平凹领悟出来的“秦岭”的真正内涵，也是中国笔记小说融汇散文简约自然之志和小说诡奇神异之情的文体寄托。由此而言，《秦岭记》的确是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也在贾平凹的创作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代世界出版社  
钱永祥著  
《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

## 真正的道德考验

□陆远

1751年，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创作了系列版画《残忍的四个阶段》，描绘了虚构人物汤姆·尼禄从小到大残忍人生的四个场景。其中第一幅展示了幼年尼禄与一帮狐朋狗友当街虐待猫狗鸽兔等宠物的情形，小动物的哀嚎也引发不了恶童们内心的恻隐。第二幅则描写了长大成人的马车夫尼禄殴打老马的情形，童年出于取乐的残忍此时已经变成一种发泄。在西方文明史上，这样以暴虐动物而取乐例子不在少数。从古罗马的大型斗兽表演，到近代欧洲贵族围猎狐狸，平民阶层斗熊、斗狗、斗鸡、斗牛，从宫廷到校园，从街头到酒馆，残酷伤害动物曾经是老少咸宜的欢笑来源。时过境迁，今天倘若有人还胆敢当众施虐，得到的一定是怒火与叱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动物对人类的情感价值和生命意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我的“社会学概论”课堂上，每次讲到“家庭”这一章，总有不少同学主动把宠物算作“家庭核心成员”。

看到这样的变化，你是不是为人类的道德进步欢欣鼓舞？且慢！倘若再做些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也许会发现许多令人扫兴的事实。比如，许多人饲养宠物，但在内心深处却只是把它们看成解闷或者炫耀的玩具，却很难认识到，再小的动物，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其间的种种细节，跟人类的生命一样复杂，有快乐有痛苦。再比如，即使那些声称不喜欢动物，主动与动物隔离的人，生活中也处处有动物的影子和碎片——为了满足人们“吃动物”的需求，现代养殖、屠宰与加工、烹饪肉类的产业规模之庞大，常令人瞠目结舌（中国人一年要消耗7—8亿头猪，近百亿只鸡）。我们当然不必，也不可能主张人人茹素，或者像弘一法师那样，在就寝前还要抖一抖竹床，以免伤害缝隙间的虫豸，但却很有必要思考一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动物、对待动物？这不是什么云淡风轻的“小确幸”，而是人类面临的深刻的道德问题。就像昆德拉说的那样，“真正的人性之善，只有在它的承受者毫无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尽其纯粹、尽其自由地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考验，就在于怎样对待这些命运完全由人类来摆布的生命：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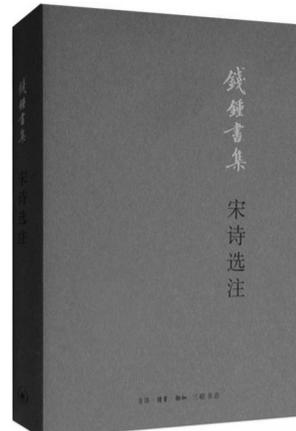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关怀，最近这些年，关心动物伦理的学者和著作不断涌现。不久前，著名学者钱永祥教授将其在“看理想”平台所做的系列节目讲稿集结为《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他从人类面对动物时的基本心理模式谈起，对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历史变迁做了一番鸟瞰，继而挖掘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追溯了动物伦理学的起源，介绍了当代动物伦理的几种主要理论，展望了动物伦理在改善社会整体价值观方面的意义，是一本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佳作。

钱教授的思考，是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一个历史悖论开始的。在人类演化的进程中，动物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关键的构成部分，但几千年来，在人类的道德地图上，始终看不见动物的踪影。在钱教授看来，这样的怪事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偏见。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动物，因此要拉近与动物的距离，发展出紧密的共存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又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其地位是高于动物的，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想象和界定动物，根据自己的需要支配和使用动物。这样的立场和观念，不是自古而然，而是逐渐演化成型的。在狩猎采集的时代，动物与人彼此处于平等的竞争关系，动物并不听命于人，反而常常成为人类尊敬、模仿乃至崇拜的对象（比如许多部落会把某种动物视为自己的祖先）。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逐渐开辟山林，整治河川，驯化动物，动物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供人类使用的资源。可以说，农业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早的，也是天生的实践者。

在钱教授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论，我们固然不可能摆脱从人类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但“其中所表现的自大与狂妄，不能不令我们有所警惕”。对动物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浩劫，狗被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但上万年来，为了配合人类的需求和审美，我们控制甚至改变了狗的习性、行为、身形和生理结构。至于猪、牛、鸡之类的经济动物，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宗牺牲品。

作为一本偏于理论思考的作品，《人性的镜子》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案，但至少可以让读者们明白，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道德容貌，我们可以对着镜子，修补自己道德人格上的残缺和虚假。

## 蒯人快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钱钟书选注  
《宋诗选注》

## 宋词之外，还有宋诗

□蒯乐昊

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清小说……一个时代与一种文艺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能恰恰说明了一切艺术样式都有其生命周期，说是时代特征也好，时代局限性也罢，长盛不衰的艺术终归罕见。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时，每每听闻父亲在国外又打了胜仗，内心就要犯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完了，自己将来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钱钟书在他的《宋诗选注》序言里这样写道。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乃至巅峰，紧随其后的宋人难免有黔驴技穷之感，北宋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雅的俗的，都被唐人玩明白了，宋人再怎么使劲，也都是唐人玩剩下的，徒呼奈何。

“诗歌的世界无边无际，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战，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钱钟书作《宋诗选注》，倒像是在稗子中选精谷，矮子里头拔将军。

请注意，他选注的不是宋词，而是宋诗，是宋人在唐人光环之下的阴影，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钱钟书一方面承认宋诗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他依然在暗处看到星火之辉。

正因为此，选注宋诗工作量颇为浩繁。选注唐诗则要便利得多，有一本《全唐诗》作为一代诗歌总汇存在那里，后人要选一滴水，只需前往这一池水中舀取。宋代诗歌不存在这样的总汇，选注者得翻阅大量诗集、选集、类书、方志，四处搜罗，才能得宋代诗歌的总貌。

来看看钱钟书精心甄选的名单吧：一方面，宋代诗歌固然绕不开欧阳修、苏轼、秦观、陆游、杨万里、王安石这样的大家，他们在诗歌之外也同有大量词作传世，但另一方面，钱钟书的名单里也囊括了许多诗名并不显扬的诗人，比如柳开、陶弼、晁端友、徐俯、韩驹、李纲……有些人只凭孤零零一首诗入选。钱老承认，文学史历来不够公道，在一切诗选里，都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只保存下来几首诗的小家更是便宜占尽，因为他们一生统共只有这么一点好东西，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令读者悠然神往，殊不知这点儿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另一种尴尬状况，是有些宋代大作家大诗人，因为词名大炽，反倒被人忽略了其诗。比如晏殊，以善于写词著称，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极其高产的诗人。他的门生曾说，“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如果这些学生没有夸张，那晏殊的诗歌作品量要超过“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可惜晏殊的词名太显赫，他作的诗反而被忽略了，这一万多篇诗都散失没有流传，直到清代才有人辑补一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里也只收录了一首。

同样只收录了一首诗的，还有宋代大词人柳永。柳永传世词甚多，按宋人评价，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的太平景象，全在柳永词中。柳词香艳糜费，多是些莺莺燕燕的“花间词”。但他一生仅留下两三首诗，却完全是另一副面目。比如钱钟书收录的这首《煮海歌》，写就了盐民的痛苦：“……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渚鹵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糗粮；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长期混迹温柔乡的风流浪子柳永，原来亦可以是严肃、悲悯和讽刺的，这首长诗不但接续着唐诗光辉，更接续着汉乐府以来的入人文主义传统。如果不是钱钟书的选注，我们会忽略宋诗，忽略文化气脉的延续性；虽每数百年必历大变，仍有坚韧内核隐地伏线千里，代代相传。

## 远见近拾